

2

顾问

丁守和

河南人民出版社

A TRIAL OF STRENGTH;
THE REPUBLIC
AND THE AUTOCRATIC

共和 与专制的较量

唐宝林
郑师渠
著

本书以共和与专制的较量为主线，描述了统治阶级内部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剖析了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吴佩孚、张作霖等特点，展示了孙中山、陈独秀等百折不挠的奋斗轨迹。本书视野辽阔，结构缜密精巧，语言生动引人，堪称一轴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的中国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 世纪的中国

2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顾问/丁守和

共和与专制的较量

A TRIAL OF STRENGTH: THE REPUBLIC AND THE AUTOCRATIC

唐宝林

郑师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 世纪的中国

共和与专制的较量

唐宝林 郑师渠 著

责任编辑 蔡 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卫生厅青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375 印张 497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215-03550-6/D·657

定价 27.00 元

序 言

· 丁守和 ·

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祝新刚先生同我谈，他们准备出一套《20世纪的中国》，按历史的发展编写10卷，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限，上半世纪5卷，下半世纪5卷，作为20世纪完整的一套系列书，希望我负责组织前面的5卷。同时将后面已出的4卷送给我，作为参考。

在我的印象中，河南人民出版社很有些眼光和魄力，也会选题。长期以来，该社已推出了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又引人注意的优秀著作，是我国有影响的出版单位之一。同时，当时我正主持撰写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1900—1992年），两者内容密切相关，就答应了。编写近一个世纪的史纲，当然要考虑很多问题，按照本世纪经历的四代不同性质的政权分为四编，每编既要有综合性概述，又要突出重点，要尽可能提出些新的看法或意见，但毕竟简略概括。而将半个世纪写成5本书，那难度就增加很多，不仅要研究很多具体事件和问题，而且要有更多的史料，特别是要发掘新的史料，总要有些新意和可读性，困难也就在这里。这不能不使我考虑更多的问题。

20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翻天覆地、风云变

幻的伟大时代。其斗争之激烈，变化之迅猛，较之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更引人瞩目，令人惊心动魄。

从国际范围看，在本世纪前半期，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弹烟血雨，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和灾难。热战之后又随之有几十年的冷战；冷战过后和平因素增多，而世界上还是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各种形式的斗争，某些地方的武装冲突亦时有发生。但是历史仍然在前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有迅速发展。从机械制造到原子电子，从坚船利炮到飞机坦克、原子弹氢弹，从卫星火箭到宇宙飞船，人类已进入电脑时代、高速信息时代，人们的家居用器亦呈日新月异之势。然而在相当大的地区和众多人口仍有饥荒饥饿；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或相当落后的地区，差距很大。历史的发展是复杂和不平衡的，而人类的创造活动总是在进步之中。

从中国情况看，刚跨进世纪之门，即发生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沦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对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争夺和掠夺。30年代，日本侵略者企图独霸中国，先侵占我东北，接着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和国内专制统治，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统一、富强，进行了长期英勇不屈的斗争，先后发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奋斗牺牲，再接再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年代，由于领导者的失误或错误，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则取得重大成就。

历史的潮流，真如“滚滚长江东逝水”，20世纪转眼即将过

去。本世纪大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多已谢世，而后起的新人则又如云涌。在这世纪之交，回顾过去的历史，总结些经验教训，展望21世纪发展，将会得到许多启示，使我们更加聪明。这是十分有益的。

实际上，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已经在对近现代历史进行回顾、检讨或反思，如提出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过去说是反帝反封建，是否抓住了历史的主题，有人则谓，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动荡（往往以“革命”的名义）的频率最高、最密集，战争、革命一直不断，结果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回顾历史总会有不同的重点或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应该注意基本历史事实，探讨那时何以难于现代化，现代化是否只是发展经济科技而不要政治民主化，各种历史事变、战争、革命发生的原因等等；如果只是简单地指责前人和历史，是无法将问题研究和阐述清楚的。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社会动荡很严重，战争与革命很频繁，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这是事实。原因何在？只要具体分析就会看到，那时的战争一是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大片领土，使中国遭到极大损害；二是专制独裁政府镇压人民反抗的战争，或各类军阀之间接连不断的战争，又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三是反抗列强侵略与腐败统治的战争，反帝反封建的战争。很明显，对这些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战争不加分析，而笼统用一句所谓往往以“革命”的名义予以讽刺或否定，是不妥的。就是革命或革命战争，也难于说是哪些人或党派制造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当时国际国内矛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将革命仅归之于某些人或党派的活动，是浅见的，应该多方

面分析才好。

历史发展是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或事变的发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原因，而且是相互交错和作用的。一般说，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的，离开偶然性也就无从谈必然性，但在大量偶然性中又确实存在或孕育着历史的必然。在历史发展中，杰出人物的作用很明显，但人们的主观因素归根到底又为客观的因果律所支配。如戊戌变法，当然与康、梁等人的宣传有很大关系，而最主要的则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及对日割地赔款，震动朝野上下，才有“公车上书”的壮举；使人们认识到，救亡图存不仅应制械练兵，发展工商，还必须改变腐朽的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就是这样缓进的和平改良，也被残暴镇压，使中国失去一次现代化机会。同样，辛亥革命也不能只看作是革命党人的活动或煽动，而是当时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所以，尽管清政府这时也实行新政，制定某些发展工商章程，废科举办学堂，成立咨议局，宣布预备立宪等，但由于种种矛盾的激发，仍难免于跨台。当时不仅因大量赔款而加重人民负担激化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而且统治集团中皇室贵族与汉人大臣的矛盾，袁世凯与摄政王的矛盾，清政府与立宪党、与咨议局资政院的矛盾，中外借款筑路的矛盾等，都在发展，表明清政府已无法统治下去，以至于武昌新军工兵营起义的枪声，竟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孙中山也觉得突然。但一系列突发性事件中，又明显反映了必然性及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所以，我认为研究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只有根据历史的实际发展，对近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及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才能阐述清楚，得出切实的认识。用今天的某些认识去

设想当时应当如何如何，主观规划过去的历史，是很难符合历史实际的，除了指责历史或历史人物外，也很难得出有益的教训。至于在建设年代所发生的重大失误或错误，当然也有客观原因，但主观因素更多些。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曾指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文化大革命”则与领导者的理论错误直接相关。邓小平就说过，是我们自己耽误了20多年。他还指出，人重要，但制度更重要，所以我们不仅要改革经济制度，还必须改革政治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研究和编写20世纪的中国历史，当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思路或不同的途径和重点，提出不同的问题进行阐述。如近现代部分可以着重从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进行研究，也可以着重从现代化或发展道路进行探讨，或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等。但无论如何，也需要重视历史的客观发展，从历史的变化发展中探寻些规律性的认识或教训。

我在接受这项工作后，曾找唐宝林、鲁振祥、房德邻、王沛、郭德宏、陈铁键、陈文桂等几位教授商谈过几次，出版社也多次来人谈过。20世纪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等著作中都有所研究和论述。我们这套《20世纪的中国》前半世纪如何写，有什么特点？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经过多次研究，依据历史的发展，确定前面5卷的书名，并要求安排章节时注意以下几点：一、既要有救亡图存、争取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论述，也要有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以政治和社会变革为主，兼及经济和文化等。二、主要事件或事变不要

遗漏，但也不要平均使用篇幅，众所周知而又无新意者可以简略；对自己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或过去未重视的问题，可展开叙述。三、要尽量发掘新史料，或人们尚未注意的史料，也要注意利用遗闻佚事，尽量提出些新认识，有些新思路或叙述方法上有所不同。四、在叙述中要思路清楚，文字清新活泼，熔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炉，切忌冗长沉闷。总之，要写成本世纪上半期的系列性专史或专著，不要写成一般性通史。

在商谈中，大家对各卷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都有所议论，我也提出些看法或想法。

关于清王朝的覆灭，过去多认为是由于清政府腐败卖国，革命党的各种活动，特别是一系列武装起义所致；未免简单化了。近来有人认为，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发展工商，宣布预备立宪，已有进步，革命党多次起义失败后已无革命形势，当时应该进行改良，革命反而造成混乱；亦缺乏对复杂情况的分析。过去主要强调革命党的作用，而指责改良派立宪派为保皇党。其实立宪派改良派与革命派有异有同，而与清政府有同有异、有真有假。梁启超与康有为亦有不同，如康主张尊孔教为国教，梁谓“我爱孔子，吾更爱真理”。就是梁的“开明专制”，革命党虽然对他进行抨击，却又受其启示，而提出“训政时期”，在当时均有道理。或谓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并无所不同，清政府的“新政”正是继承了洋务运动。这也不尽然。变法维新提出君主立宪，设制度局，改变官制等。清政府镇压了戊戌变法，而又继承了变法的要求；但八国联军战争后，即使“新政”超越了维新变法时的要求，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也难免倒台。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应该具体分析和叙述。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主要问题是专制与共和的较量。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改变了人们长期存在的“政府可变，皇帝不可无”的传统观念，而专制制度却无多少改变，或只是形式的改变。袁世凯是掌握大量北洋军队的“强人”，已当上终身总统，本来是可以统治下去的，但他一旦想当皇帝，便很快被推倒，清废帝的复辟更是短命。中国外受列强压迫，内有军阀统治，在欧战期间现代经济虽有发展，小生产仍占主要地位。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是爱国民主运动，又是文化启蒙运动，使中国文化发生新的转机；而由于国家危亡，很快又转向政治斗争，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或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带有偶然性和感情作用；亦未必尽然。一是人们对中国假共和的失望；二是由欧战引起人们对西方制度的怀疑；三是俄国劳农革命的影响，而劳农又使人们易于理解；四是中国虽为战胜国，巴黎和会上列强却压迫中国将青岛让给日本等，因而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当资产者政党尚未取得政权，而无产者政党又登上舞台，共产党、国民党实际上都是在当时苏俄的影响和帮助下建立或改组的，两党合作打倒了北洋军阀，而其分裂亦属必然。历史实在是复杂的，也只有对复杂情况进行复杂的分析，切不要简单化。

十年内战期间，内争外患交错。有同志提出一般是说“内忧外患”，用“内争”似不顺，但“忧”又不足以反映“争”的内涵，而且也不违反文法，故仍用内争。所谓“内争”，首先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打了近10年内战。二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和战争，如蒋唐战争、蒋桂战争、蒋阎冯中原大战，还有地方军阀战争等；政治斗争也很激烈，如蒋汪斗争、蒋胡（汉民）斗争等，并有福建人民政府、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及粤桂反蒋活动等。三是

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有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造成很大损害，斗争也很尖锐。还有各区的肃反，如中央苏区肃 AB 团，鄂豫皖区、湘鄂西区、闽西区肃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无例外地都有扩大化，而以中央苏区为先，以张国焘统治的鄂豫皖最严重，错杀了许多干部和高级干部，造成惨重损失。可以看到，被错杀的领导干部远较在战场上牺牲的为多，这是惨痛教训。日本侵占我东北后，民族矛盾上升，而内争仍然未已。日军向华北地区进逼，迫使国共两党都不能不考虑息争对外的问题。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政府也通过其驻苏使馆和国内的一些线索同中共进行某些接触。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压蒋氏，中共促成和平解决，终于实现国内和平，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作了准备。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搏斗。一是全民族的抗战，国民党、共产党、其他爱国党派、爱国团体和全国工农兵学商、各个民族都抗战。蒋介石提出“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毛泽东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驱逐日寇出中国”。国民党主张“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中共全面阐明了“持久战”，对抗战都是尽力的。二是无论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和军队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三在民族战争中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国民党政府拒绝民主改革，总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并发动多次反共事件；中共则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壮大自己的力量。彭德怀领导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也说打得好，再来一个。但随之敌人调集大量兵力围攻、“扫荡”抗日根据

地，于是又批评彭暴露了自己力量，背上包袱，犯了战略错误。1979年我们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军事学院同志写的《百团大战问题探讨》，才把这个案翻过来。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全面阐明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一系列思想路线、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极大地发展了人民的力量，对抗战胜利作出杰出贡献，这都应该具体叙述。

抗日战争刚胜利，国内矛盾立即突出，两种命运的决战必不可免。国民党有400万军队，以中央政府名义急欲消灭共产党，实现其在全国的统治。中共在抗战中发展100多万军队，200万民兵，并有广大解放区，亦势在必争。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人民都希望和平。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立联合政府，并作出让步。国民党政府在调集大量军队北上的同时，也说要和平统一、和平建设。在多次谈判和政协会议上，最关键的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问题，国民党强调先要军队国家化，中共则提出应先政治民主化，民主党派游移其间，最后达成同时进行。然而和平协议刚签订，全面内战就爆发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依恃其优势兵力和美械装备，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中共主要力量。中共开始准备长时间抵抗，但形势发展很快，仅仅4年就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这不是偶然的。固然与战略战术指挥有很大关系，但最根本的是国民党统治专制独裁腐败，完全脱离人民，而中共得到广大人民，包括国统区人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拥护。这里人心向背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共主要是依靠农民、发动农民取得胜利的，然而如何使农民摆脱小生产精神枷锁的束缚，改造农民传统的平均主义、皇权主义旧观念，并未能解

决；同时因快速胜利而滋长了骄傲情绪，孕育了后来出现的个人专断个人迷信等问题。这又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可以思考的。

总之，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很复杂的。我们研究问题应该有唯物辩证的观点，从事实出发，进行具体深入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实事求是，写出有较高水平的著作，这是我们的希望。

经过作者们两年多的努力，1994年下半年，有4部书稿已先后交来。我原想两三周看完一卷，实际用了半年多时间才看完。边看边思考，边用铅笔在稿纸旁边写些意见，或夹个便条，有的在章节上作些调整。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前后工作了18年，所以在审稿时总爱进行挑剔，从问题的思考到文字修饰，提些意见或增或减，或自己的看法想法，都写下来。看完一卷即退给作者，并当面再概括谈几条意见。同时也说明，我的意见主要是供参考，采纳与否请作者定夺。有人说当编辑审稿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我却总是认为作编辑工作给别人提意见，对自己研究问题、思考问题也很有好处，这也是编研相长吧！

《共和与专制的较量》一书，其中有关袁世凯的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师渠教授所写，以下各部分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研究员所撰。二位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论著颇丰。

本书时限1912—1927年，这段历史已有许多史家研究过，论著也出不少，再加上近些年来新史料发现不多，如何能写出新意是颇为困难的。作者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努力尝试用新的视角审视这段历史，根据本书“共和与专制的较量”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力求有所突破，并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所研究。

像不同的画家画同一只虎做出不同的作品一样，历史本来是已经过去、自然也是定型了的事情，但不同时代、不同史家，对同一段历史、同一个事件或人物，依然能写出不同的论著来。这种情况，从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角度看，不仅不必非议，而且是应该提倡的。据此，作者对过去一些已经定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提出了某些新的看法。因为时代毕竟在前进，使人们能站在更全面的起点上去实事求是和公正地评价过去，总结经验，警戒未来。例如：过去只强调用阶级观点修史，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一概否定、打倒，而缺乏应有的分析。这段历史的当权人物，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到蒋介石，自然都不例外。本书作者在揭露他们罪恶统治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活动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评论，而并非简单地概括为从小就是坏种。对一些正面人物的发展或变化也作了具体研究分析，不落一般化的窠臼。

军阀混战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过去往往报以“春秋无义战”的眼光，也是一概否定。其实有的战争的某一方也多少有点“吊民伐罪”的因素，客观上有某些积极因素，本书也作了具体分析。同样的道理，蒋介石指挥的北伐战争，在“四一二”以后，从革命的意义上来说，性质是改变了，而从“统一”的意义上看，仍不失有进步的因素。所有这些，也许是中国社会在这段历史中缓慢发展的一种曲折反映。

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和民主思想，虽然只是在民国初年像昙花一现很快被扼杀，但它的影响一直存在着，并且成为制约与推翻一个个军阀统治的主要潜势力。因此本书取名为《共和与专制的较量》。应该说，过去对这一点是评价不足的。一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二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三是因为它

是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相对立的。所以，人们往往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超过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其实，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民族，如果连一点点可怜的资产阶级民主都不能容忍，何以建设更高级的无产阶级民主。

在写作方法上，作者也尽量多用些过去被忽略的新史料，并在总体上正确把握历史主线的前提下，收录了一些逸闻佚事，穿插其中，以增强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以上主要是说明作者的一些主观想法，而且作了些努力，但客观效果究竟如何，那就有待读者批评了。

目录

序言	(1)
第一章 “中华共和国”的字样终于刻在了	
万里长城上	(1)
一 古老的中国欢庆共和的诞生	(1)
二 “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	(4)
三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11)
四 惜阴堂与南北议和	(16)
五 共和果实得而复失	(22)
六 历史的沉思	(27)
第二章 短暂的共和光华	(33)
一 民初“参政”热	(33)
二 “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	(39)
三 共和“新教育”	(42)
四 社会风俗的变动	(46)
第三章 袁世凯破坏共和制度与同盟会势	
力的误导	(50)

1265/100

一 袁氏专制之性成	(50)
二 唐绍仪拂袖而去	(55)
三 混合内阁、政党内阁、超然内阁	(59)
四 陆征祥内阁的风波	(63)
五 张振武之死	(69)
六 孙中山转向实业救国	(75)
七 “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同盟会改组为 国民党	(80)
八 孙、黄联袂北上的误导	(84)
第四章 迟到的觉醒	(90)
一 宪政试步的悲剧	(90)
二 宋案的真相	(95)
三 “此地无银三百两”	(101)
四 元凶我行我素	(106)
五 法律解决？武力解决？	(110)
六 袁世凯先下手为强	(114)
七 如此“二次革命”	(118)